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y



国际问题论丛


东亚 安全合作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阎学通 编
周方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东亚 安全合作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亚 安全合作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阎学通 编
周方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安全合作/阎学通,周方银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0

(国际问题论丛)

ISBN 7-301-07675-4

I. 东… II. ①阎…②周… III. 国际问题—安全—研究—东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D81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3561 号

书 名: 东亚安全合作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著作责任者: 阎学通 周方银 编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675-4/D·094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785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9.875 印张 328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编者简介

阎学通 男,1952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理事,中国亚太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理事,国防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论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国际形势与台湾问题》、《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中国与亚太安全》、《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发表有关国际关系的论文和文章上百篇,其中部分发表在美国、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国的报刊杂志上,部分文章被美国、日本、新加坡、罗马尼亚等国的报刊杂志全文翻译或转载。

周方银 男,1971年生于湖北。1992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理论、方法、模型》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现代国际关系》、《国际论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Preface

East Asia has enjoyed a peaceful era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t it is still very vulnerable. Due to the lack of an effective reg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 regional security of East Asia is still faced with many uncertainties. Since the middle of 1990s, security expert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push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2003,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ix-Party Dialogue on the nuclear issu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timulated new thoughts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in East Asia. During December 13—14, 2003,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invited eminent scholars from seven countries to a symposium on *East As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fter this meeting, our institute invited some participants of the symposium along with other scholars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We asked them to write papers separately on the strategic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potential threats to regional security, the evolution of security concep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a new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All of these researches were aimed at strengthening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contributors to this collection come fr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Indonesia,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Although they agree on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y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reats and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different opinions do not necessarily undermine each other instead they provide more approaches to develop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 hope that this collection can help more people become aware of the urgent need and importance of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nd stimulate our readers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 also have the ambitious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inspir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policy makers of East Asia. Being editors, we don't mean we agree with all of the arguments made by the authors.

Finally, I would like express my gratefulness to Ford Foundation for its generous support to our symposium and related research. I also want to show my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or its decision to publish this English academic book. If not for their support, there would be no such chance for readers to benefit from the insightful ideas in this book.

Yan Xuetong
Tsinghua University
May 26, 2004

中文简介

Chinese Introduction

冷战后,东亚的安全状态成为国际关系学界所关注的一个谜,一方面是东亚地区冷战后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另一方面是该地区没有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为了深化对东亚和平问题的认识和促进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与发展,2003年12月13—14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了“东亚安全合作国际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七国,都是长期从事安全问题研究的学者和官员,大多数还是所在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到会做主旨演讲,并回答了与会学者的提问。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解决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缺乏领导的问题,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中可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组织形式和机制的问题等。与会的学者们就上述问题分析了东亚安全的现状并提出许多建立东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议。会后,我们邀请专家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并将他们的成果收集成册发表。

本书共收入12篇文章,并按地区安全理论、地区安全合作和地区经济合作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5篇文章试图通过研究东亚和平与安全的现状,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从而深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论认识。第二部分的5篇文章试图通过研究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特点和问题,总结该地区安全合作的具体经验,从而促进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第三部分的2篇文章通过分析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总结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关系,为未来的地区安全合作

提供经验。从理论上,我们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理解地区安全合作的性质,澄清和平与安全、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这些概念的区别,理解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合作制度与安全合作网络的关系。从政策上,我们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看清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和特点,认识各方的立场和战略目标,了解东亚地区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以及建立新的东亚安全机制的建议和设想。

在第一章《和平定义:和平与安全》一文中,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对于何谓和平以及和平与安全存在何种关系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和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现象必然有一些自然特征。这些自然特征主要是其非暴力性、不安全性和非永久性。

和平的非暴力性是指人类集团间没有武装暴力行为的自然状态。和平与战争是两种对立的安全状态,但却不是安全的全部状态,在它们之间还有非战非和的状态。安全状态是指人类集团间武装暴力行为的发生情况。根据武装暴力行为的有无和程度,安全状态可分为和平、非战非和与战争三种。没有武装暴力行为的状态为和平,程度低的为非战非和,程度高的为战争。非战非和与和平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完全排除了武装暴力现象。

和平的不安全性是指在和平状态下依然存在威胁、危险和恐惧。依据安全程度,和平可有四种不同安全程度,即不安全、不太安全、较安全、绝对安全。由于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因此和平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安全的,即处于不安全、不太安全和较安全三者之一的程度上。作者认为,和平与安全不是等同的概念。首先,和平与安全的性质不同。和平是一种安全状态,它不表明威胁、危险和恐惧的有无和程度。和平只证明没进行战争,并不证明国际社会或国家没有战争危险或没有外部军事威胁。此外,和平必然是双方或多方共享的,而安全则可以单方独享。第二,同在和平时状态下,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程度可能不同。例如,在同一和平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安全程度是不同的;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在不同和平时期面临军事威胁的程度也不同。第三,如果仅从国家安全程度上观察,和平状态下的国家安全程度甚至可能低于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安全程度。

和平的非永久性是指和平的出现与结束是重复循环的。和平与战争两者之间的相互转换源于它们内部有利于对方的因素不断增长。在和平时期,力量不均衡的发展、利益冲突的加剧、敌对情绪的增长、好战思潮的蔓延等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或其中一个因素发展到了极点,都有可能结束国际和平状态。不过和平的非永久性表现为无规律的周期性,这说明和平虽不能永久但可以延长。

作者也讨论了和平的社会特征,认为和平的主要社会特征是其目的性、工具性和正义性。和平的目的性是指和平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不过,和平并非人们无条件追求的目的,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以和平为追求目的是源于人的后天社会性而非先天的动物性。

和平的工具性是指和平可作为方法实现人的目的。例如,中国争取和平环境以更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人类选择和平来解决利益冲突,其主要的理性原因是,在有些情况下,和平的效力比战争的效力高且成本低。当战争方法比和平方法更有效并且成本更低时,人们就可能放弃和平而选择战争手段。

作者认为,和平作为自然的安全状态是不存在正义性的问题的。根据和平具有目的与工具双重性的特点,作者认为,和平与战争一样,作为人类集团关系的客观状态,其状态本身并无正义与否可言,而是当事方中有可能有正义方与非正义方之分。和平作为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存在正义与否的问题。和平的正义性仅限于追求和平的目的和以和平方法实现正义的目的两种情况。如果以和平方法损害他人利益,和平同样是非正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对法西斯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就是典型例子。

该章对“和平”与“安全”做的性质区分,使我们可以理解冷战后的东亚有和平没有安全的合理性及其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人们将“和平”这一概念简单地等同于“安全”。在冷战时期,人们所关心的核心安全问题就是世界大战的危险,于是长期将“世界和平”等同于“国际安全”的观念就自然形成。冷战后,世界大战的危险不再是东亚的现实安全问题了,世界大战危险与东亚安全脱钩了,但是东亚国家面临的地区局部战争危险并不因此就

消除。于是,冷战后就出现了东亚这种有和平无安全的安全状态。冷战后东亚一方面享受了多年的和平,但同时面临着战争危险不断上升的形势,即朝鲜核问题与台湾问题引发战争的危险不断上升。

在第二章《东亚的十年和平》中,阎学通教授分析了冷战后维持东亚和平的核心变量是什么这一问题。该章回顾了对冷战后的东亚和平所做的单一因素解释,并指出这些解释与实际情况的不一致。例如,中美地缘均势论认为冷战后东亚和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作为大陆强权维护东亚大陆的和平,美国作为海洋强权维护了东亚海岛国家的和平。然而这种解释既不符合冷战后中美的实际实力对比,也不符合东亚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情况。伙伴关系互动论认为,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源于该地区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的互动。但冷战后东亚安全的历史并不支持伙伴关系互动论的分析,即不能证明伙伴关系与东亚安全稳定两个变量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复杂利益牵制论认为,东亚国家的安全利益错综复杂,各国在实现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彼此牵制,于是有关国家采取了克制态度,因此形成东亚的稳定和平。然而复杂利益牵制论的核心变量“复杂的利益关系”面临着如何比较和衡量的问题。冷战后东亚地区的历史事实也不支持这一论点。

在对已有解释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冷战后东亚出现的非均势态势下的核威慑、东盟集体安全合作的扩展以及韩国的和平统一政策,这三个因素构成东亚和平的充足条件。其中,非均势态势下的核威慑是其他两个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

在该文中,“非均势态势”是指冷战后东亚地区的一超多强格局,主要大国的总体军事实力对比不在同一个等级;“核威慑”则是指对立双方具有有效威慑对方的战略核能力或核保护伞。在非均势态势下形成的核威慑,其威慑的功能不同于均势态势下的核威慑。在总体实力均衡的态势下,核威慑双方的安全目标都不满足于生存安全,而是在生存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争取不亚于对方的对等安全。在非均势状态下,核威慑双方的安全目标则是不同的。双方不再追求对等安全,而是强势一方将安全目标提升为绝对安全,弱势一方将安全目标降为生存安全。面对总体实力上的等级差距,弱势一方不再

进行代理人战争以追求对等安全,这就减少了核威慑双方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危险。与此同时,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军事扩张的容忍度提高,强势一方的军事扩张引发战争的危险下降。不过,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军事扩张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即当强势一方军事扩张直接威胁到弱势一方的生存安全时,弱势一方仍会以核战争相威慑。这就迫使强势一方采取适度扩张而非无限扩张的政策,即其扩张或战争对象不能是对弱势一方构成直接生存威胁的地区。

作者通过对非均势核威慑态势下强国策略和弱国策略的博弈分析说明,在非均势核威慑下,弱国追求生存安全,强国追求绝对安全,构成了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了检验这一理论解释,作者把东亚国家按军事实力水平划分为霸权国、强国、小国三类,运用非均势核威慑的原理对它们的和平关系进行考察。发现非均势态势下的核威慑具有维护霸权国与核大国和平关系的作用,具有维持强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功能,还有维护东亚地区强国与小国之间和平的功能。但是作者发现非均势核威慑的原理难以解释,东亚小国之间以及霸权国与小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于是,作者引入了两个补充变量:冷战后东盟集体安全体制的扩展和韩国的和平统一政策。在非均势核威慑的基础上,这两个变量使得东南亚国家和东北亚国家间的和平得以实现。

东亚和平显然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但穷尽这些因素对我们理解冷战后的东亚和平并无实质性帮助。作者通过寻找最少的变量以构成东亚和平充足条件的方法,确定维护东亚长期和平的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东亚国家制定的安全政策有助于保持这三个基本变量不变,东亚面临的安全威胁就会受到抑制,反之则不然。由此,作者得出的长期维护东亚和平的原则应为,保持东亚现有的非均势核威慑状态,在此基础上,东盟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其集体安全政策,支持韩国长期坚持和平统一政策。对于东亚中近期的安全前景,作者认为,近期内将主要取决于韩国能否坚持其和平统一的政策,中期内则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保持其核威慑的效力。

第三章《东亚的两极与均势》是由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教授撰写的。作者认为,冷战后,美国虽成为全球唯一

的超级大国,但东亚仍是相对稳定的两极均势格局。在东亚,日本和俄罗斯缺乏与中美竞争获得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两极格局与地理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美竞争面临着军备竞赛、军事危机和战争的压力,因此处于低烈度状态;在较长时期内,中美都无力挑战对方在其影响领域的支配地位。

作者认为,美国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并不能在每个地区都享有霸权。地区实力结构与全球实力结构并不一致。由于“力量衰减的梯度”的作用,霸权的实力在遥远的地区会显著减弱,其影响力在较远的地区与其他大国属同一等级,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均势格局。冷战后,美国在东亚并无霸权,而是与中国在地区均势中分享大国地位。冷战后,中国在东亚大陆上拥有了支配地位,而美国则在东亚海域处于支配地位。不过东亚均势格局的实力分布状态明显有利于美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扩展了它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美国加强了与东亚盟友的关系,扩大了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增强了约束中国的相对实力。与此同时,美国还将更多的军事力量从欧洲调防到东亚。除了加强在东亚的常规实力外,美国也试图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强化它在该地区的战略核优势地位。部署反导系统可消除其他国家的“最低威慑能力”,从而使美国获得首先使用常规力量对付地区大国的自由。有效的导弹防御体系将使中国的威慑力量无效,这将增强美国在涉及中国的地区冲突问题上使用武力的决心。美国在东亚寻求的是更大的优势而非自身安全。美国担心中国能力长远发展结果,美国想保持目前美中的经济、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差距。

应对美国的压力,中国努力增强其国防能力。中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进口必要的军事装备,其短期目标是维持台湾海峡现状,长期目标是实现统一。这一努力的结果将全面提升中国应对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军事能力。中国试图发展国内的基础设施,以建立更为先进的经济基础,从而能够在一个高技术战争的时代与美国相竞争。中国还通过寻求国际支持的方式来约束美国。作者认为,中国注重发展经济,既是一种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安全政策。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国没有采取明显制衡美国实力的行为,而是容忍了美国在中

国周边扩大其影响。

作者认为评估东亚实力平衡的长期趋势,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在目前的两极格局中,东亚发生军备竞赛、军事危机与战争的危险性有多大?二是中国何时有能力改变东亚现状,建立新的实力均势?中国是否有能力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回去”?作者认为,东亚的两极格局具有以陆地和海洋划分的特点,这一特点有助于将中美在该地区的对抗维持在低水平上。中国的陆地优势和美国的海上优势,使双方在其影响范围内具有一种防御性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在陆地上的能力的上升并不导致美国在海上的安全相应地下降;同样,美国在海上的军事存在的加强,也不会使中国在陆地上的安全相应地降低。这就弱化了螺旋式军备竞赛的压力,减轻了双方用核武器威慑对方的压力,减少了增强可信的扩展性威慑力的需求。这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下相互威慑明显不同。

作者认为,中国在东亚建立起新的实力均势格局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在经济、技术、军事能力方面的先发优势很强,而且中国想建立与美国一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此外,中国在东亚平衡美国实力的目的,还受到东亚复杂的安全环境的制约。因此,在21世纪前期的很长时期内,东亚地区的力量均势将是稳定的。

罗斯教授在本章中的地缘政治分析,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东亚地区能否长期维持和平,其关键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虽然罗斯教授与阎学通教授都认为东亚地区现有实力结构有利于维护东亚和平,但前者认为核心是中美在东亚总体实力的均衡,而后者则认为关键是中美总体实力不均衡下的核威慑。因此罗斯教授担心中国缩小中美总体实力差距的努力,而阎教授则担心美国部署反导系统会使中国的核威慑力无效。

第四章《绝对获益、相对获益与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一文,是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李彬教授完成的。作者视中美关系为东亚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他研究了冷战后中美之间发生负面互动事件的原因,以期寻找防止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对抗的方法。作者观察到,冷战后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敌对程度不断增强。人们所熟悉的

安全困境、中美结构性矛盾或者美国对中美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这些传统观念都不能有效地解释美国对华安全政策负面性质不断增加的现象。

作者认为,从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的关系角度来解释冷战后的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为清楚的图像。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华安全政策的制定不仅考虑其本身的安全,而且考虑其获得的安全利益是否大于中国所获取的安全利益。作者建立了一个二阶段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双边安全关系。他认为,当一方的安全政策既定时,另一方则希望在当前的博弈中削弱对方,为在今后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创造条件。由于安全博弈不是一次性的,因此博弈者会担心对方利用关系缓和的时机积蓄实力,怕对方实力增强在以后的博弈中对自己构成威胁或伤害。简单地讲,安全政策追求相对获益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拉大双方的实力差距,或是防止双方实力差距的缩小。反过来讲,如果对方在当前博弈中所获得的好处不会在日后被用于威胁自己的安全,那么博弈者的安全政策制定就会以扩大绝对获益为出发点,而不担心其他国家的安全收益,也不会从相对获益的角度考虑安全政策了。

依据这个理论解释模型,作者分析了为何冷战后美国担心中国的安全收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恶化使得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自然下降,美俄军事实力的差距日益扩大,也就是美俄安全关系中美国的相对收益呈上涨之势,因此美国不再担心俄的安全实力变化。与俄国情况相反,冷战后中国的总体实力不断上升。中国经济不但在冷战后保持了高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势头有可能长期保持下去。这就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虽然,冷战后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并非像经济增长这样快,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为今后国防实力的增长提供了基础。美国在冷战后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其自身安全有了较充分的保障,因此其安全政策更多的是考虑如何保持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也就是相对获益问题。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也是源于这一原则,即压制中国的相对收益。作者举了两个典型例子加以说明。为了防止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美国宁可采取损害美国经济利益的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为了扩大其在太空中对中国的

军事优势,美国宁可放弃禁止外空武器化的政策。

作者还注意到,冷战后美国在对华安全政策决策中对中国安全获益的关切与中国总体实力的增长是同步的。这表明,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负面考虑是由双方实力差距缩小造成的,而不是误解导致的。美国越了解中国的发展潜力,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心就越强,因此靠加强双边交流减少误解是不能消除美国制定负面对华安全政策的。作者认为,改进中美战略关系的重点在于影响美国的获益关切。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的实力增长不会在将来伤害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就会减少与中国的敌对态度。因此。从中国角度来讲,改善中美关系的重点不是强调现实的双边共同安全利益,而是要调整一些大的战略目标,使美国认识到中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并未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例如,中国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就容易使美国认为中国将来要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李彬教授提出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相对获益,这与阎学通教授提出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罗斯教授提出美国东亚安全政策是寻求更大优势而非自身安全是非常相似的。李彬教授认为中美结构性的矛盾只存在于安全问题上,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安全现状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即东亚国家在安全上的矛盾并不必然扩大到非安全领域,而非安全领域的地区合作有可能减弱安全矛盾激化的危险。作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提出了从减少战略意图对立性入手减少双方关系负面事件的政策建议。

第五章《反思国际反恐合作:应用与超越地缘政治》,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杨洁勉先生撰写的。作者认为,“9·11”事件以后地缘政治理论再度成为流行的学说,并已对美国 and 某些大国的反恐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地缘政治理论不能够解决许多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问题或全球性问题。面对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以及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地缘政治的思想,用更广阔的视角和更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更有效地应付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以确保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虽然在地缘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布什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它在应付世界事务中的新发展方面并不是同样成功。“9·11”事件提醒美国,两洋对美国领土的隔离作用不再是保护其本土安全的自然屏障。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地理屏障的作用在减弱或消失。现在美国更为强调远距离的军事投放能力,并视那些拒绝或者未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为其优先打击目标。在战术层面上,美军在为未来的反恐战争,而不是与地区大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在结盟方面,为了应付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美国将和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

作者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地缘政治思想多有不同。第一,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相对来说是防御性的,不强调也不追求控制对于主导世界的目标来说具有地理战略方面重要性的关键地区或国家。自16世纪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就不再提倡扩张政策。第二,西方的地缘政治思想是全球主义,而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则强调区域主义。第三,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对地理和地理环境作用作辩证的分析,而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战略则认为地理与国家战略行为之间有简单的“线性”相关性。第四,西方地缘政治是由学者提出的,学术色彩浓厚,而中国地缘政治思想来源于政治家们的实践,政策性强。第五,中国要防止按西方地缘政治思想设计地缘战略,而应争取有利于发展的地缘环境。

作者认为,冷战以后的地缘政治思想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一、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倾斜于由美国领导的西方;二、新地缘政治格局与旧有的地缘政治格局相互重叠;三、地缘政治格局从集团与对抗转向形式上的多样化;四、地缘政治的全球化加快了;五、传统地缘政治的范围从陆地和海洋向太空和网络空间扩展;六、经济与科技因素的作用变得更为突出;七、现代地缘政治更加强调动态性与开放性。地缘政治经受着全球化、市场与信息时代的挑战,但是地缘政治学说和地缘战略仍有影响,地理环境仍会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发挥重要影响。各国对地缘战略的重点不同,美国寻求全球的地缘政治制高点,欧洲、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则优先关心直接与它们相关的地区。

作者认为,地缘政治无疑是当今国家外交决策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完全抛弃地缘政治还为时过早,并且是有害的。在国际关